

「誤國」者的側寫——東晉謝氏之清談興家的營謀

劉浩洋

摘要

「清談」是魏晉時代特有的文化現象，它既是學術活動，也是社交活動。現今針對清談的研究，大多從政治史或學術史的角度展開，較未能以社會觀察的視野，探討清談就社交意義上對魏晉士人所帶來的影響。本文立足於此，選擇以興盛於東晉時期的陳郡謝氏家族為觀察例證，描述這個在清談歷史上頗具代表性的豪門鉅族，其初如何透過社交圈流行的清談活動逐步取得聲名，繼而在門閥社會特殊的選才制度下，憑藉聲名取仕，又憑藉仕途立功，最終則靠著龐大功勳振興家業的一連串苦心經營的謀略。至於此種利用清談提升家族地位的社會現象，亦可藉以針對古今聚訟不已的「清談誤國」問題，重新加以檢視，並說明清談的社交性質因與士族的利祿途徑交疊太深，方是清談所以誤國的根本原由。

關鍵詞：魏晉、清談、謝鯤、謝安、教育

The Profile of Those who Bungled the Nation —the Planning and Strategies of the Xie Family in Eastern Jin Dynasty for Using Qingtan to Lead the Family Reputation up the Ladder

Liu Hao-yang

Abstract

“Qingtan” is a unique cultural phenomenon of the Wei-Jin period. It is not only an academic activity but also a social activity. However, present researches on Qingtan are unfold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olitical history and academic history, instead of social observations,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s of Qingtan on the social contact of Wei-Jin scholars. Based on the above, this study used the example of the Xie family thrived in Chen Commandery during Eastern Jin Dynasty to describe the series of elaborate planning and strategies that this rich and powerful family of high representativeness in the history of Qingtan used to win its reputation progressively through participating in the Qingtan activities prevalent in social circles at that time, obtain official positions by using its reputation under the unique talent selection system of family monopolized society, perform deeds of merit by using its official positions, and eventually raise its family reputation by resorting to its exploits. In this study, the endlessly controversial issue of “pure theories and talks without action will get the nation into trouble” was re-examined by investigating this kind of social phenomena in which Qingtan is used to increase the social status of families. In addition, the study indicated that Qingtan bungled the nation mainly because the social nature of Qingtan was deeply entangled with scholars’ access to official positions.

Keywords: Wei-Jin, Qingtan, Xie Kun, Xie An, Education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Huafan University.

一、前言

「清談」是魏晉時代特有的文化現象。傳統上對於魏晉清談有些根深蒂固的看法，即認為清談起源於漢末清議的消極轉變，並標誌著魏晉名士的任誕風氣，清談的本質原是空談玄理，而代表人物則是縱酒避世的「竹林七賢」¹。只可惜，這些看法雖不無根據，畢竟未盡周全。所謂「魏晉清談」：

指的是魏晉時代的貴族知識分子，以探討人生、社會、宇宙的哲理為主要內容，以講究修辭與技巧的談說論辯為基本方式而進行的一種學術社交活動。²

這是現今針對清談最準確的一個定義。的確，清談是一種學術活動，「可以肯定，以清談為主而著述為輔，即是玄學特有的論辯形式」³；同時，清談也是一種社交活動，它是魏晉士人「各標風致，互騁才鋒」的鬥智遊戲，「此如法國十八世紀有沙龍，亦略如近人有雞尾酒會，自是當時名士一種風流韻事。」⁴不過，這種以哲思為消遣的心智娛樂，向不為通經致用的儒者所認同，而睽諸魏晉國運的迍邐，時論遂衍生出土風淪墮的「清談誤國」之說。⁵事實上，不僅當世儒者與此指控，即或談玄名士也不免心存隱憂：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

¹ 《世說新語·任誕》1：「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見〔南朝宋〕劉義慶撰，〔南朝梁〕劉孝標注，徐震堦校箋：《世說新語校箋》（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頁390。

² 唐翼明：《魏晉清談》（臺北：東大圖書，1992年），頁43。

³ 王葆玟：《玄學通論》（臺北：五南圖書，1996年），頁162。

⁴ 俱見錢穆：〈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係〉，收於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三）》（臺北：素書樓文教基金會、蘭臺出版社，2000年），頁206-276。

⁵ 明遺民顧炎武云：「魏晉人之清談，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謂楊、墨之言，至於使天下無父、無君，而入於禽獸者也。」見〔清〕顧炎武撰，〔清〕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臺北：世界書局，1991年），卷13，〈正始〉，頁307。這是後世廣為人知的「清談誤國」之說。事實上，早在魏晉時代儒者對談玄之風便多所抨擊；可參李則芬：〈魏晉清談〉，收於李則芬：《兩晉南北朝歷史論文集》中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頁185-240。

壘，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

謝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⁶

王羲之（303-361）、謝安（320-385）皆雅好清談⁷，倘「誤國」的罪名成立，則王氏之言猶似悔罪自新，而謝氏之語誠屬罪無可道。然徵諸史冊，王羲之於匡濟晉室無尺寸之功，謝安於綏靖江左則有千秋之業；如此看來，在「誤國」與「清談」之間，似乎形成了某種繪影先於見形的弔詭。

其實，歷來聚訟於「清談誤國」的正反意見亦不少，但果須裁量其然否的意義卻不大，因為控方訴之以社會風氣的敗壞，或辯方迴之以政治責任的釐清，二者從來就不是立足在同一個論述基準上。不過，兩造的視野倒頗有共通之處，那便是極度的「宏觀」（macro approach）。將清談置於歷史的總體脈絡中，的確有助於掌握其由來影響與發展大勢，但若忽略了清談原是以「人」為主體的文化行為，亦即闡明清談在魏晉士人眼中有何價值，便容易產生錢穆（1895-1990）所謂「誠如隔靴搔癢，終搔不到當時人癢處所在」⁸的盲點。近代心理學有「側寫」（profile）一門，意在由犯罪者的行為模式描繪其心理狀態，並推斷出可能的嫌犯特徵與犯案動機；那麼，假設清談確實觸犯了傾覆宗廟的彌天大罪，為了重建「犯行」的原委，針對「誤國」者所進行的側寫當屬必要之事。至於案例的首選，不妨從袒護清談固已「罪證確鑿」的東晉謝安家族起始。

二、躋登龍門：謝鯤「由儒入玄」的識鑒

謝安出身陳郡陽夏（今河南省太康縣）謝氏家族，與名相王導（276-339）所代表的琅邪王氏並為東晉兩大鉅族，史稱「王謝」。事實上，陳郡謝氏於南渡初期仍是個「新出門戶」⁹，西晉以前甚至沒沒無聞。謝家之所以躋登上流社會，契機在於「兩晉之際，謝鯤由儒入玄，取得了進入名士行列的必要條件」。¹⁰謝鯤（281-324）為謝安伯父，史載：

⁶ 《世說新語·言語》70，頁71。「右軍」指王羲之，曾任右軍將軍；「太傅」指謝安，卒贈太傅。

⁷ 《晉書·謝安傳》：「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見〔唐〕房玄齡等奉敕撰：《晉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57年），卷79，頁1013。

⁸ 錢穆：〈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係〉，頁265。

⁹ 《世說新語·簡傲》9：「謝萬在兄前，欲起索便器。于時阮思曠在坐，曰：『新出門戶，篤而無禮。』」見頁414。謝萬，謝安之弟；阮思曠，即阮裕，屬陳留阮氏，大族。

¹⁰ 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166。

謝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也。祖纘，典農中郎將；父衡，以儒素顯，仕至國子祭酒。鯤少知名，通簡有高識，不修威儀，好《老》、《易》，能歌，善鼓琴，王衍、嵇紹並奇之。¹¹

典農中郎將設於曹魏之世，主掌屯田民政，位同太守，並非顯職；國子祭酒則為太學官長，可稱「碩儒」¹²，卻非「名士」。謝鯤上承父祖之業，不治經術，而「好《老》、《易》」，顯然在思想上已離棄儒訓，改慕玄風：

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頭散髮，裸袒箕踞。其後貴遊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毋輔之之徒，皆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為「通」，次者名之為「達」也。¹³

「清談與任誕合流，清談名士中從此多放蕩之士」¹⁴，這是兩晉之際逐漸興起的一股效法「七賢」遺風的「林下風氣」；謝鯤搭上順風車，開始在一幫門第響亮的貴遊子弟中嶄露頭角。不過，若以為思想趨向《老》、《易》，行為模仿「七賢」，便能大大提升社會地位，未免一廂情願。所謂「由儒入玄」，根據「書不盡言」——亦即談辯優於著述的玄學信條¹⁵，自然應高踞在清談座上妙析微言，藉以博得賞譽，何況「當時清談，正成為門第中人一種品格標記。若在交際場中不擅此項才藝，便成失禮，是一種丟面子事」¹⁶；換言之，謝鯤「入玄」之得以晉階上流，其人「通簡高識」固為底蘊，但能言交名賢方是先決條件。

茲舉一例，說明清談在社交意義上足供有心人揚名立萬的實質效益：

康僧淵初過江，未有知者，恒周旋市肆，乞索以自營。忽往殷淵源許，值盛有賓客，殷使坐，粗與寒溫，遂及義理。語言辭旨，曾無愧色；領略粗舉，一往參詣。由是知之。¹⁷

¹¹ 《晉書》，卷49，〈謝鯤傳〉，頁666。

¹² 〔晉〕孫盛《晉陽秋》：「謝鯤……父衡，晉碩儒。」見《世說新語·文學》20 劉注引，頁113。

¹³ 〔晉〕王隱：《晉書》；《世說新語·德性》23 劉注引，頁14。

¹⁴ 唐翼明：《魏晉清談》，頁216。

¹⁵ 可參王葆玟：〈『書不盡言』前提下的玄學討論方式——清談及其與清議的關係〉，《玄學通論》第3章，頁157-193。

¹⁶ 錢穆：〈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係〉，頁267。

¹⁷ 《世說新語·文學》47，頁126。淵源，殷浩字。

康僧淵（生卒不詳）是具有胡人血統的僧人，殷浩（303-356）則是東晉的清談領袖。康僧淵從過江之初「未有知者」的乞索自營，到結廬豫章時「庾公諸人多往看之」¹⁸的天下知名，關鍵正在於當他面對殷浩此等清談高手之時，儀容談吐「曾無愧色」，辯言析理「一往參詣」，由此深獲與會賓客的一致讚譽；而「康僧淵別的地方不去，偏選擇了殷浩，自然也有『收名定價於君侯』之意，而其結果，也果然是一登『龍門』，便身價十倍」。¹⁹可知憑藉清談獲取聲名，連方外之人尚不免「忽往」之舉，則濟濟多士的能言之流，其「利齒噉名」²⁰的居心，自不言可喻。

康僧淵的例子可以套用在謝鯤身上，只不過當時的「龍門」尚非殷浩，而是西晉的王衍（256-311）。史載其人：

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為事。……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矣。累居顯職，後進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選舉登朝，皆以為稱首。矜高浮誕，遂成風俗焉。²¹

謝鯤既為王衍「奇之」，想來也是「後進之士」中的「景慕放效」者。但他更得王衍的器重，「時王敦、謝鯤、庾歆、阮脩皆為衍所親善，號為『四友』」²²；這份貴重當世的青睞，顯然來自王衍的胞弟，亦即謝鯤結交的「貴遊子弟」之一——王澄（269-312）的美譽：

（謝鯤）遷敦大將軍長史。時王澄在敦坐，見鯤談話無勸，惟歎謝長史可與言，都不眴敦。其為人所慕如此。²³

謝鯤以其卓越的清談表現深受王澄讚歎，兩人又因追慕通達的「林下風氣」締結同好之誼，加上王衍看待一時名士向有「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

¹⁸ 同上註，〈棲逸〉11，頁360。「庾公」指庾亮，權傾一時，卒贈太尉。

¹⁹ 唐翼明：《魏晉清談》，頁258。

²⁰ 《世說新語·排調》54 記載王羲之曾嘲諷愛好清談的晉簡文帝為「噉名客」，簡文帝則反譏王羲之為「利齒兒」。見頁437。

²¹ 《晉書》，卷43，〈王戎傳〉附〈王衍傳〉，頁594-595。

²² 同上註，〈王戎傳〉附〈王澄傳〉，頁596。同書〈胡毋輔之傳〉：「（胡毋輔之）與王澄、王敦、庾歆俱為太尉王衍所昵，號曰『四友』。」見卷49，頁668。可知「四友」概為虛數，其時謝鯤、胡毋輔之諸人皆甚獲王衍賞識。

²³ 同上註，卷49，〈謝鯤傳〉，頁667。「敦」即王敦，時任鎮東大將軍。

三」的定見，「有經澄所題目者，衍不復有言」²⁴，於是謝鯤乃得以躍入「一世龍門」，頂著人人欽羨的「四友」頭銜，在高品雲集的上流社會打響陳郡謝氏的名號。

清談的聲譽很快為謝鯤帶來了政治機會。西晉末，「太傅東海王越聞其名，辟為掾」；南渡初，王敦（266-324）先引為長史，「以其名高，雅相賓禮」，後王敦欲叛，乃「出鯤為豫章太守，又留不遣，藉其才望，逼與俱下」。²⁵可知謝鯤在政壇上的機遇泰半出自其「高名」或「才望」，未必果真於濟世安邦之事有何實效。在清談歷史上，以王衍為首的西晉元康（291-300）談坐雖紹承曹魏的正始（240-249）談坐而興，但就社交意義觀之，二者卻殊有異趣。正始談坐本於心智娛樂之外，尚有政治意圖²⁶，故名士透過清談社交相互標榜，進而引為同道，其現實層面的用意乃在「多樹親黨，屢改制度」²⁷，此頗與漢末清議藉由鑒別人倫以結交志士的作法若合符節。至於元康談坐則純以清談為消遣，名士間並無共同信念，唯見位高者援引才流以妝點門風，後進者自附驥尾以哄抬家業，積習日久，時人遂競相以虛名晉身，終至與實務背馳。試觀王衍「三窟」之計：

衍雖居宰輔之重，不以經國為念，而思自全之計。說東海王越曰：「中國已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為荊州，族弟敦為青州。因謂澄、敦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為『三窟』矣。」識者鄙之。²⁸

王澄、王敦是時俱無「文、武兼資」之實功，卻以高名橫得方鎮之重任，究不能不原諸王衍「阿平第一」、「處仲第三」的虛譽為其興家保身的伏筆。可知正始名士以談名相尚，朋黨耳，猶不致荒廢實務；元康名士以談士自高，門第耳，終不免爭逐虛名。唐史臣謂「識者鄙之」，未詳誰指，然兩晉名士憑藉清

²⁴ 俱同上註，卷 43，〈王戎傳〉附〈王澄傳〉，頁 596。王澄，字平子；庾敷，字子嵩；王敦，字處仲。

²⁵ 俱同上註，卷 49，〈謝鯤傳〉，頁 667。時豫章為封國，故謝鯤當為「內史」，其職約同郡之「太守」，後世因多混稱。

²⁶ 此即曹爽、何晏、鄧颺、丁謐等名士所主張的「正始改制」；可參王葆玟：〈玄學興起的社會政治背景和玄學家的改制運動〉，《玄學通論》第 2 章，頁 87-155。

²⁷ 《晉書》，卷 1，〈宣帝紀〉，頁 25。此言曹爽、何晏等人柄政於正始年間之事。

²⁸ 同上註，卷 43，〈王戎傳〉附〈王衍傳〉，頁 595。

談風標以經營家族前途，乃當世人普遍常識，特手段有高下隱顯而已。即如陳郡謝氏雖由謝鯤「入玄」為名士，而其弟謝裒（生卒不詳）仍出身儒宦²⁹，承繼家業；是知王衍自有「三窟」之計以周全王氏，而謝氏亦未嘗無「兩可」之謀以因應潮流。

元康談坐既非聲氣相求之地，甚者流為沽名釣譽之所，故時人之崇虛名而輕實務，此所以「矜高浮誕，遂成風俗焉」，不可全然歸咎玄理微言。而當此露才揚己之世，未有非常之神悟，難得非常之重名；非常之神悟且未易得，乃巧取於非常之行徑。西晉末葉所以興起「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的「林下風氣」，自與此譁眾取寵的心態有關。謝鯤取徑「通達」一路以資其談名，終得如願攀附貴遊而躋登「龍門」，但他的志量原不止於此，故王敦興亂之際，謝鯤乃以「杖眾望以順群情，盡沖退以奉主上」的一席話直言極諫，「是時朝望被害，皆為其憂，而鯤推理安常，時進正言。」³⁰此一骨鯁的形象，頗與其放浪形骸的作風大相逕庭。史論「鯤有勝情遠概，為朝廷之望，故時以庾亮方焉」³¹，然庾亮（289-340）其人「風格峻整，動由禮節」³²，與謝鯤的任誕習氣恰好相反，可見時人均視謝鯤乃外達士而內君子，故與庾亮跡異而心同。不過謝鯤此等外疏內密的處世態度，實亦「祖述於籍」：

鯤不徇功名，無砥礪行，居身於可否之間，雖自處若穢，而動不累高。敦有不臣之跡，顯於朝野；鯤知不可以道匡弼，乃優遊寄遇，不屑政事，從容諷議，卒歲而已。³³

史稱阮籍（210-263）「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³⁴，此種故作放達的態度，不僅使阮籍在司馬氏假仁孝為殺奪的恐怖統治中竟以壽終，也令陳留阮氏得歷魏、晉嬗替猶能綿延為大族——這對生逢「八王之亂」，卻又亟望出人頭地的謝鯤而言，無疑是絕佳的典範。畢竟陳郡謝氏該時尚未顯揚，無法如王衍兄弟憑權勢互為羽翼，為避

²⁹ 《晉書·謝安傳》：「父裒，太常卿。」同上註，卷 79，頁 1013。按太常卿職掌太學事務與宗廟祭祀，例由儒者出任。

³⁰ 俱同上註，卷 49，〈謝鯤傳〉，頁 667-668。

³¹ 〔晉〕鄧粲：《世說新語·品藻》17 劉注引，頁 280。

³² 《晉書》，卷 73，〈庾亮傳〉，頁 937。

³³ 同上註，卷 49，〈謝鯤傳〉，頁 667。

³⁴ 同上註，〈阮籍傳〉，頁 658。

免罹禍族滅，謝鯤於是自命「七賢」之徒，進則可矯飾談名以圖位望，退亦能避匿穢行以保身家。今觀謝安每稱譽其伯謂「若遇七賢，必自把臂入林」³⁵，此言誠大有深意；因謝鯤模仿「七賢」不僅出於精神上的追慕，甚且更為其興家保身的遠略。史評謝鯤「豈惟識量淹遠，至於神鑒沉深」³⁶，苟非其遠慮深謀的識鑒，則其人縱不害於王敦之手，亦豈能「使謝氏家族未因王敦之逆而受牽連，這證明謝鯤頗具慧眼，並非純粹的宅心方外，不以世物嬰心之人」。³⁷

三、經遠無競：謝安「東山志立」的長算

晉元帝永昌元年（322）4月，王敦既叛，殺戮朝臣。是時謝鯤以「才望」作為政治看板的價值大幅減低，於是王敦始「使之郡」；居官豫章一載，「蒞政清肅，百姓愛之。」³⁸可見謝鯤十分明白清談的美譽足可提供政治機會，但「要維持並增進門戶勢力，還必須靠事功」。³⁹可惜不久後，謝鯤即去世。

謝鯤之死並未打亂陳郡謝氏力爭上流的盤算，他的兒子謝尚（308-357）在有志栽培之下，已徹底繼承父親「入玄」的路線：

謝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鯤之子也。……八歲神悟夙成，鯤嘗攜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坐之顏回也！」尚應聲答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席賓莫不歎異。⁴⁰

這段記載出自《世說新語》，原文謂：「謝仁祖年八歲，謝豫章將送客；爾時語已神悟，自參上流，諸人咸共歎之。」⁴¹或許唐人頗疑一個八歲小兒如何能「自參上流」，從事清談，因而更動語序，遂形成謝尚「一鳴驚人」的戲劇效果。實則魏晉名士為不墮家風，十分重視子弟此等社交能力的培養，故八歲即稱神童，亦有以致之，此詳下節。謝尚自幼以清談得名，「及長，開率穎秀，辨悟絕倫，脫略細行，不為流俗之事」⁴²，時人以「令達」⁴³目之；可見他和父

³⁵ 《世說新語·賞譽》97，頁259。

³⁶ 《晉書》，卷49，〈謝鯤傳〉，頁667。

³⁷ 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頁167。

³⁸ 俱見《晉書》，卷49，〈謝鯤傳〉，頁668。

³⁹ 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頁167。

⁴⁰ 《晉書》，卷79，〈謝尚傳〉，頁1012。

⁴¹ 《世說新語·言語》46，頁59。

⁴² 《晉書》，卷79，〈謝尚傳〉，頁1012。

⁴³ 《世說新語·賞譽》104，頁261。

親謝鯤一樣，皆採「達行」搭配「談名」，以要時譽。而時譽也同樣換得了官遇，「司徒王導深器之，比之王戎，常呼為『小安豐』，辟為掾。」⁴⁴王導以王戎（234-305）擬謝尚，表示謝尚走的仍是「七賢」之徒的達道；所不同者，阮籍終身遺落世務，而王戎則歷仕為晉臣。

陳郡謝氏從「新出門戶」逐步蛻變成望族，確實源自謝尚累居方鎮的功業；王導慧眼，的有深鑒。謝鯤死後，謝氏家長為其胞弟謝裒；謝裒曾任侍中、吏部尚書等職，官銜較謝鯤為高，然名望遠遠不如。昔謝裒欲與諸葛恢（284-345）結為姻戚，諸葛恢答以「江家我顧伊，庾家伊顧我，不能復與謝裒兒婚」⁴⁵，對謝家門第頗為輕視；但這樁婚姻卻在諸葛恢死後順利談成，其時謝尚方於晉康帝建元 2 年（344）晉陞南中郎將，旋「復以本號督豫州四郡，領江州刺史；俄而復轉西中郎將，督揚州之六郡諸軍事、豫州刺史，假節，鎮曆陽」⁴⁶，權勢日盛。可知謝尚乃如實執行其父謝鯤(1)藉清談得名→(2)藉談名取仕→(3)藉仕途建功→(4)藉功業興家的完整策略，成功令陳郡謝氏搖身而為東晉中期舉足輕重的權貴世家。⁴⁷試喻之：在此一潛心規劃的營謀中，謝家或依據個人資質天賦，由謝鯤挑戰「入玄」這條新興卻充滿變數的終南捷徑，其弟謝裒則「守儒」持家，以為一旦有故時猶得分散風險的安全閥；至於謝鯤雖推進了(1)、(2)兩階，卻在第(3)步驟時天不假年，故留待其子謝尚始全面達成此一目標。

自謝尚憑豫州刺史以為西藩，「豫州是謝氏家族地盤，是謝氏家族得以興旺發達的實力基礎」⁴⁸；謝尚死後，方鎮之職由其堂弟謝奕（約 309-358）⁴⁹、謝萬（321-362）⁵⁰相次繼任。也許是由謝鯤的機遇摸清了潮流的脈息，謝裒的兒

⁴⁴ 《晉書》，卷 79，〈謝尚傳〉，頁 1012。「安豐」指王戎，以平吳之功，封安豐侯。

⁴⁵ 《世說新語·方正》25，頁 174。諸葛恢長女初配庾亮長子庾會，於門第為高攀；後庾會死於蘇峻之亂，乃改適陳留江彪，於門第為下嫁。此語意謂陳郡謝氏尚不在門第考量之列。

⁴⁶ 《晉書》，卷 79，〈謝尚傳〉，頁 1012。

⁴⁷ 田餘慶謂：「謝鯤躋身玄學名士，謝尚取得方鎮實力，謝安屢建內外事功」是陳郡謝氏在東晉發展的軌跡，所言甚是。（《東晉門閥政治》，頁 174）然田論未及詳備此一發展軌跡的策略脈絡，特別是「入玄」的實質效益，以及清談居中的關鍵影響，這正是本文所欲彰明之處。

⁴⁸ 同上註，頁 169。

⁴⁹ 謝奕生年歷來失考，按謝尚為其從兄，故出生不得早於西元 308 年。又《世說新語·德性》33：「謝奕作剡令……太傅時年七、八歲。」（頁 20）按謝安 7 歲時，謝尚年 19，則謝奕應以 18、19 歲出任剡令較近情理，故其生年約當西元 309 年。

⁵⁰ 關於謝萬生卒，史載：「廢為庶人。後復以為散騎常侍，會卒，時年四十二，因以為贈。」見《晉書》，卷 79，〈謝安傳〉附〈謝萬傳〉，頁 1021。按詔復謝萬在升平 5 年（361），

輩如長子謝奕、三子謝安、四子謝萬，皆屬「名士」之流。謝奕「少有器鑒」⁵¹，具多少清談本事已不可得知，但他「每因酒，無復朝廷禮」的脫序演出，輒令桓溫（312-373）戲稱為「方外司馬」⁵²，顯然也追隨了「林下風氣」。謝萬則為謝氏「入玄」的佼佼者：

萬字萬石，才器雋秀；雖器量不及安，而善自銜曜，故早有時譽。工言論，善屬文；敘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四隱四顯，為〈八賢論〉。其旨以處者為優，出者為劣，以示孫綽；綽與往反，以體公識遠者，則出處同歸。⁵³

陳郡謝氏雖多清談之士，但真能於玄理上高標新義者，則絕無僅有；謝萬〈八賢論〉自是談辯的延伸，屬於玄學命題中的「自然」與「名教」之辨⁵⁴，可惜現已不傳。謝奕、謝萬皆以清談得官。謝奕初仕較謝尚為早，後因「從兄尚有德政，既卒，為西藩所思，朝議以奕立行有素，必能嗣尚事」⁵⁵，乃繼任為豫州刺史；所謂「立行有素」，對照謝奕的「方外」達行，只怕仍屬談名的成分居多。謝萬則「早有時譽」，「簡文帝作相，聞其名，召為撫軍從事中郎。……既見，與帝共談移日」⁵⁶；清談名士之因談得名、因名取仕，臣僚晉謁而至「共談移日」，可謂盡在不言中。

然而，謝奕、謝萬並未能貫徹謝氏的興家之計，反而暴露其高度風險。本來此一策略的四個步驟之間，僅作跳板，並非實階，故於任何一步失足，非但無法興家，甚且可致敗族。例如清談不競，未必博得美名，此許詢（生卒不詳）所以欲苦折王脩（約 327-約 350）⁵⁷；矜名傲物，未必有益仕途，此王羲之所

則其生卒似為西元 320-361 年；然謝安、謝萬同年出生，此甚可疑。考升平 5 年 5 月晉穆帝崩，哀帝即位；同年 7 月國葬，次年改元隆和。故知詔復謝萬，當出自新君籠絡，其時應在升平 5 年末，謝萬尚存；及至詔下未就而卒，宜在隆和元年（362）。

⁵¹ 〔南朝宋〕何法盛：《晉中興書》；《世說新語·德性》33 劉注引，頁 20。

⁵² 俱見《晉書》，卷 79，〈謝安傳〉附〈謝奕傳〉，頁 1017。桓溫與謝奕為布衣交，時辟之為安西司馬。

⁵³ 同上註，〈謝安傳〉附〈謝萬傳〉，頁 1020-1021。「安」指謝安。「嵇」，刻本作「稽」。

⁵⁴ 略覽文義，謝萬之言近乎「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說，孫綽之語則近乎「名教即自然」之論。

⁵⁵ 《晉書》，卷 79，〈謝安傳〉附〈謝奕傳〉，頁 1017。

⁵⁶ 同上註，〈謝安傳〉附〈謝萬傳〉，頁 1021。「簡文帝」即會稽王司馬昱，時任撫軍大將軍，權同宰輔；其人好清談，一時名士多齊集門下。

⁵⁷ 昔許詢聞時人以王脩相比，忿忿不平，故於清談座上苦相折挫，以決優劣；可參《世說新語·文學》38，頁 122。按王脩生卒失考，本傳云：「轉中軍司馬，未拜而卒，年二十

以訕笑於時賢⁵⁸。至於風險之高，無如祿仕而功敗；風險之深，無如恃功而家危。謝奕挾狂名高倨方鎮，已見飄搖之態，然其居官年餘遂卒，故禍尚不及於身；至謝萬以哲流事軍旅，受命北伐，竟「以率任之性，欲區別智勇」⁵⁹，於是士卒離心，遂潰敗而還，終至廢為庶人，將陳郡謝氏十數年於豫州之基業，一夕敗完。而於此家業傾圮的危急存亡之秋，作為分散風險之用的一個潛在安全閥發揮了功能，那就是隱居東山多年的謝安。史稱其人：

謝安，字安石，尚從弟也。……及總角，神識沉敏，風宇條暢，善行書。弱冠，詣王濛，清言良久；既去，濛子脩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疊疊，為來逼人！」王導亦深器之，由是少有重名。⁶⁰

謝安因「神情秀悟，善談玄遠」⁶¹為王導賞識，「初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並以疾辭。」⁶²所謂「疾辭」不過是託辭，實則謝安意在「優遊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娛」，故其棲遲歷年，又高臥東山，「六、七年間，徵召不至；雖彈奏相屬，繼以禁錮，而晏然不屑也。」⁶³但謝安的隱居並非與鳥獸同群，而是「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的清談遊賞。這種言如高士、行同達生的「名士」作風，經由社交圈的反覆傳揚，乃為謝安贏得了「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⁶⁴的不世之譽。而謝安本人也絕非縱心事外、塵務不經，是故：

謝萬北征，常以嘯詠自高，未嘗撫慰眾士。謝公甚器愛萬，而審其必敗，乃俱行。……謝公欲深著恩信，自隊主將帥以下，

四。」同上註，卷 93，〈王濛傳〉附〈王脩傳〉，頁 1187。考其父王濛之生卒為西元 309-347 年，其弟王蘊為 330-384 年，則王脩生年應界於西元 326-329 年，卒年在 349-352 年；其時殷浩方於晉穆帝永和 6 年（350）元月加中軍將軍，意欲北伐，故王脩未及拜中軍司馬而卒，宜在此年。

⁵⁸ 王羲之素與王述爭名，先出為會稽內史，後遇王述就任揚州刺史，王羲之恥為之下，故求分會稽為越州，乃大為時賢所笑；可參《世說新語·仇隙》5，頁 496-497。

⁵⁹ 同上註，〈品藻〉49，頁 289。

⁶⁰ 《晉書》，卷 79，〈謝安傳〉，頁 1013。「疊疊」，勤勉貌，意喻滔滔雄辯。

⁶¹ 〔北魏〕王愔：《古今文字志目》；《世說新語·文學》55 劉注引，頁 130。

⁶² 《晉書》，卷 79，〈謝安傳〉，頁 1013。

⁶³ 俱見〔南朝宋〕檀道鸞：《續晉陽秋》；《世說新語·賞譽》101、77 劉注引，頁 260、255。「禁錮」，褫奪出任權利。

⁶⁴ 《世說新語·排調》26，頁 429。

無不身造，厚相遜謝。及萬事敗，軍中因欲除之，復云：「當為隱士。」故幸而得免。⁶⁵

謝安審時度勢，預見危機，故兜售人情，以貸謝萬一死；其深謀遠慮，猶在謝鯤之上。後「及萬黜廢，安始有仕進志，時年已四十餘矣」。⁶⁶可知謝安之「東山志立」⁶⁷，實為門戶之計。

茲舉殷浩為例，同時說明謝安、謝萬兄弟成敗功過的原由。史稱殷浩：

殷浩，字淵源。……識度清遠，弱冠有美名，尤善玄言。……為風流談論者所宗。……稱疾不起，遂屏居墓所幾將十年。于時擬之管、葛，王濛、謝尚猶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因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反，相謂曰：「淵源不起，當如蒼生何？」⁶⁸

可知謝安的際遇全然為殷浩的翻版。此因清談可招致名望，而名望可獲致高位，故魏晉談宗大多是望、位兼具的人物；在魏晉士人心中，望與位，猶如名與實，「循名責實」才能滿足多數人的期待。殷浩「棲遲積年，累聘不至」⁶⁹，名之曰孝行，實則藉清談「養望」；當他以「動心駭聽」⁷⁰的口才博得難以想像的盛名，繼之而來，必是「名實相符」的顯職。殷浩此等心機，其清談老友劉惔（約314-約349）所稱「卿諸人真憂淵源不起邪」？⁷¹早已一語道破。果不其然，當桓溫勢大，「簡文以浩有盛名，朝野推伏，故引為心膂，以抗於溫」，殷浩便以建武將軍、揚州刺史「參綜朝權」⁷²，後舉兵北伐，明顯瓜分桓溫的勢力。然殷浩又是謝萬的前車之鑑。此因談可得名，名可取仕，但言效不等同事功，耗神於清談甚且有礙於政務；魏晉名士迷信才稱於性、業著於德的擇賢方式，結果往往造成「言過其實」的悲劇。殷浩、謝萬同以能言之流，兵敗黜廢，其理一也。

⁶⁵ 同上註，〈簡傲〉14，頁415。「謝公」、「隱士」皆指謝安，時方未仕，故布衣隨軍。

⁶⁶ 《晉書》，卷79，〈謝安傳〉，頁1014。

⁶⁷ 《世說新語·賞譽》77，頁255。

⁶⁸ 《晉書》，卷77，〈殷浩傳〉，頁999。「淵源」，刻本作「深源」，乃唐人避高祖李淵諱。「管」即管仲，「葛」即諸葛亮。

⁶⁹ 〔南朝宋〕何法盛：《晉中興書》；《世說新語·識鑒》18劉注引，頁221。

⁷⁰ 《世說新語·文學》28，頁118。

⁷¹ 同上註，〈識鑒〉18，頁221。

⁷² 俱見《晉書》，卷77，〈殷浩傳〉，頁1000。

謝安「東山志立」之初，基於謝萬新敗，兼之有「禁錮」的成命在先，自然無法比照殷浩的身價，因而乃接受征西大將軍桓溫諷請朝廷徵為司馬。當時桓溫聲威赫赫，謝安不得不以一世高名屈就其僚屬，利用權臣的庇蔭以圖謝氏再起的機會。⁷³此時，謝安長年高臥東山所培養的令譽，開始發酵：

謝公作宣武司馬，屬門生數十人於田曹中郎趙悅子。悅子以告宣武，宣武云：「且為用半。」趙俄而悉用之，曰：「昔安石在東山，搢紳敦逼，恐不豫人事；況今自鄉選，反違之邪？」⁷⁴

謝安深知自己作為桓溫的政治看板，一如伯父謝鯤之於王敦；但陳郡謝氏已不是吳下阿蒙，故他並非「從容諷議，卒歲而已」，而是採取依附輸誠的策略，放下身段，不避庶務，再透過位望拔擢自家人才，進而壯大實力。其後，謝安即憑藉桓溫的信任，累遷侍中、吏部尚書、中護軍，終得參贊機要；至於其力阻桓溫之篡，又力克淝水之戰，既功在晉鼎，復將陳郡謝氏推至東晉南朝第一流門戶，此青史昭著，茲不贅述。然謝安高臥東山，是否果如殷浩「屏居墓所」般具有待價而沽的意味？試觀其自白：

初，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翕集家門，傾動人物。劉夫人戲謂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乎？」謝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⁷⁵

既曰「恐」，可知謝安確無出仕的志願；既曰「不免」，則知謝安未嘗無出仕的盤算。在謝氏興家的四個步驟中，謝安早年僅登進一階，遂自樂於斯。此等思慮猶如今人購買名畫「保值」，苟非日後山窮水盡，自當徜徉於藝文風雅，又豈庸計較行市之有無，此謝安所以「繼以禁錮，而晏然不屑」；不幸謝萬功敗，家資盡喪，則謝安固當賣畫求現，自售於世，犧牲快意人生，將多年積蓄之談名換取仕途，以圖建功、興家之利基為其翻本，此司馬昱（320-372）所以稱「既與人同樂，亦不得不與人同憂」，而斷定「安石必出」⁷⁶。

⁷³ 田餘慶謂：「桓溫促成謝萬之廢，意在摧毀謝氏實力的基礎。謝安出仕仍不得不經由桓溫軍府，不是謝氏出仕沒有其他途徑，而是欲借此表示謝、桓通家之誼，消除謝萬被廢而出現的家族之間的緊張狀態。」見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頁170。

⁷⁴ 《世說新語·賞譽》102，頁260。「宣武」即桓溫，卒諡宣武侯。

⁷⁵ 同上註，〈排調〉27，頁429-430。

⁷⁶ 俱同上註，〈識鑒〉21，頁223。

史稱謝安執政，面對國事如麻，「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算」⁷⁷，則其「東山志立」，亦未始非早年韜晦於清談遊賞，以預作門戶安危之防的「長算」之計。又謝氏於淝水大捷後，功蓋天下，恩澤一門，然謝安卻「以父子皆著大勳，恐為朝廷所疑」，故揖讓官爵，均分權勢，務使士族間「彼此無怨，各得所任」⁷⁸；則對照其堅隱於兄弟富貴之際，絕仕於論譽清揚之時，可知謝安「東山志立」於謝氏興家之計的第(2)階，進則彌補了謝萬的祿仕功敗，再則防堵了諸謝的恃功家危，史論「其經遠無競，類皆如此」⁷⁹，允為定評。

四、庭階玉樹：謝玄、謝朗「談何容易」的教育

謝鯤藉「林下風氣」興家保身、進退由時，謝安憑「東山之志」遵時養晦、出入見機，足見「清虛規避、明哲保身」⁸⁰實為門閥士族賴以綿延的一門學問。但增進門戶勢力須靠事功，減退家族禍患當效隱逸，熊掌與魚，如何兼得？對此，陳郡謝氏自有應對之道：

安嘗戒約子姪，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
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
安悅。⁸¹

謝安問子姪有何方法能不捲入政治，卻取得良好的成就？謝玄（343-388）則以「芷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⁸²的典故，表示當使風度高持的芝蘭玉樹，一皆生長在謝氏的門庭中。這指的自然是建立門第風標，亦即將謝家子弟培養成「談名」與「達行」兼具的清談名士；畢竟若能調教出一、二社交名流引領風騷，便足使整個家族在門閥社會裡得到永續發展的契機。

由於清談是「以探討人生、社會、宇宙的哲理為主要內容」，因而一位清談名士的養成，首先必要熟習當日社交圈廣泛流行的一些「言家口實」，亦即

⁷⁷ 《晉書》，卷 79，〈謝安傳〉，頁 1014。「算」，刻本作「筭」，字同。

⁷⁸ 俱同上註，頁 1015。「子」指謝玄，為謝奕之子，謝安之姪，淝水之戰居首功；時朝廷欲授荊、江二州方鎮，謝安止之，並改薦桓氏出掌。

⁷⁹ 同上註。

⁸⁰ 孫以繡：《王謝世家之興衰——我國門閥政治之一「個案」研究》（臺北：三民書局，1967年），頁 145。

⁸¹ 《晉書》，卷 79，〈謝安傳〉附〈謝玄傳〉，頁 1017。

⁸² 《荀子·宥坐》；〔戰國〕荀況撰，王忠林註譯：《新譯荀子讀本》（臺北：三民書局，1972年），頁 408。

圍繞《易》、《老》、《莊》「三玄」及其衍生出的諸多玄學命題。試觀南齊王僧虔（426-485）〈誠子書〉云：

曼倩有云：「談何容易！」見諸玄，志為之逸，腸為之抽。專一書，轉誦數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尚未敢輕言。汝開《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所異，《指例》何所明，而便盛於塵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設令袁令命汝言《易》，謝中書挑汝言《莊》，張吳興叩汝〔言〕《老》，端可復言未嘗看邪？談故如射，前人得破，後人應解，不解即輸賭矣。且論注百氏、荊州「八秩」，又「才性四本」、「聲無哀樂」，皆言家口實，如客至之有設也。汝皆未經拂耳警目，豈有庖廚不脩，而欲延大賓者哉？⁸³

根據王僧虔對子弟的諄諄教誨，可知「要做一個名副其實的『談士』，除了天分自不可不高以外，還要讀很多書，做很多研究。至少，第一，要熟讀三玄的原籍；第二，要熟悉各家的注解及其異同；第三，要研究前人的清談成果」。⁸⁴王僧虔是琅邪王氏的後裔，這段「談何容易」的肺腑之言，既揭示了清談的精緻性與學術性，也表露出王、謝以下，門閥士族何等企盼後世子弟皆能成為出色的清談名士，憑藉富厚的才學與識見為立身揚名之資，務期家聲隨之克振，而家業亦可賴以不墜。

同時，清談也是「以講究修辭與技巧的談說論辯為基本方式」的社交活動，因此教育清談名士，不但須著重談吐秀逸、詞鋒犀利，還應模擬論辯攻防，以免登上社交檯面卻忸怩澀訥，貽笑大方。此點，「《世說新語》有關名士家族成員間清談要數謝氏最為突出」⁸⁵，尤其「謝安經常召集子侄聚會，談詩論文，探究玄理，或『私庭講習』，對子侄進行家庭教育」⁸⁶，充分反映其「經遠無競」

⁸³ 〔南朝梁〕蕭子顯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南齊書》（臺北：鼎文書局，1987年），卷33，〈王僧虔傳〉，頁598。東方朔，字曼倩，西漢人；其「談何容易」語，原指人臣進言之難，王僧虔則引申為清談不易。王弼，字輔嗣；何晏，字平叔，皆正始名士。「馬」即馬融，「鄭」即鄭玄，皆東漢經師。「令」指袁粲，曾為尚書令。「中書」指謝莊，曾為中書令。「吳興」指張永，曾為吳興太守；一說張緒，曾為吳郡太守，「興」字或誤。考證詳見唐翼明：《魏晉清談》，頁320；同書余英時〈序〉，頁1-12。

⁸⁴ 唐翼明：《魏晉清談》，頁69-70。

⁸⁵ 王志邦：〈謝安風流與中國士人〉，收於世界謝氏宗親總會編輯：《謝太傅安石紀念論文集》（臺北：世界謝氏宗親總會，1994年），頁218-241。

⁸⁶ 朱紹侯：〈陳郡謝氏在東晉〉，收於世界謝氏宗親總會編輯：《謝太傅安石紀念論文集》，

的興家策略，亦表現在借助清談以培植「庭階玉樹」作為謝氏接班人的用心。今觀謝安與子姪間的清談教育，頗具章法次第，非徒暢敘天倫而已。茲舉數例：

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暹稱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告。」謂此句偏有雅人深致。⁸⁷

謝安及姪兒謝玄分舉《詩經》中〈大雅·抑〉和〈小雅·采薇〉與子弟共同品賞，此種吟詠佳句的討論，當日十分常見，如王恭(?-398)「行散至其弟王睹戶前，問：『古詩中何句為最？』睹思未答。孝伯詠『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為佳。』」⁸⁸兄弟間尚不時以詩句吟詠往還，足見對經典文學的欣賞，自是清談教育中涵養情致、豐富語彙的基礎工夫。再看：

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⁸⁹

清談論辯講究臨場反應，言語交鋒不容片刻遲疑，謝安在「講論文義」之餘隨機以「白雪」命題，目的正在測驗子弟的談吐是否精進。姪兒謝朗(約342-?)⁹⁰以「撒鹽空中」比喻飛雪，或許於形象上已差相近之，但姪女謝道韞(生卒不詳)「柳絮因風」的形容，無論就辭采或風韻而言，都更加符合清談活動對音旨之美的追求。時人讚賞謝道韞「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⁹¹，顯然謝家的清談教育亦已培養出一流的「女名士」。再看：

頁 67-84。

⁸⁷ 《世說新語·文學》52，頁128。「暹」，謝玄小字。

⁸⁸ 同上註，〈文學〉101，頁149。王恭，字孝伯，屬太原王氏，大族。「行散」，服五石散後藉徒步以祛其藥性。「睹」，王爽小字。引詩出自古詩十九首之〈迴車駕言邁〉。

⁸⁹ 同上註，〈言語〉71，頁72。「兄子」指謝朗，謝安仲兄謝據之子，小字胡兒；「兄女」指謝道韞，為謝奕之女。

⁹⁰ 謝朗生卒歷來失考，史載：「(謝玄)與從兄朗俱為叔父安所器重。」見《晉書》，卷79，〈謝安傳〉附〈謝玄傳〉，頁1017。按謝朗長於謝玄，則生年當在西元343年前；又謝朗之父謝據，排行第二，卒年33，故生年應界於西元310-319年，卒年在342-351年。兩相比對，可知謝據之生卒約當西元310-342年，且謝朗之生年即其父之卒年，故《世說新語·文學》39載其母言「新婦少遭家難」(頁123)，可資一證。

⁹¹ 《世說新語·賢媛》30，頁378。

晉武帝每餉山濤恒少，謝太傅以問子弟，車騎答曰：「當由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忘少。」⁹²

品評人物是魏晉時代的流行風尚，除一流的口才之外，過人的鑒識眼光也是進入上流社會必備的應對能力。雖然「具體的政治批評、具體的人物批評，都是不能叫作『清談』」⁹³，但人事品評卻是訓練清談能力的有效條件。謝安的題目是以山濤（205-283）屢次為國舉才，但司馬炎（236-290）總是吝於賞賜一事，希望子弟加以評論。而謝玄的回答雖不合「常理」，卻極似「名言」；短短十二字，既盛讚山濤的「寡欲」，復開脫武帝的「寡德」。這不僅符合理想清談中「辭約旨達」的要件，同時也頗具幾分「拔新領異」的天賦。⁹⁴不過，人事品評亦有其限度，當「謝遏諸人共道『竹林』優劣」時，謝安便立刻制止謂「先輩初不臧貶『七賢』」⁹⁵；畢竟「竹林七賢」在兩晉士人心中早已成為崇高的典範，若幾個名不見經傳的晚生公然在社交場合上說長道短，必成為極度失禮之事。再看：

謝公云：「賢聖去人，其間亦邇。」子姪未之許，公歎曰：「若郗超聞此語，必不至河漢。」⁹⁶

這顯然是謝家內部的一場小型清談，談主由謝安擔任，內容大約是聖人「有情」、「無情」之辨或「性情」之辨等玄學論題；謝安站在「賢聖去人，其間亦邇」的立場，卻受到子弟的群起駁難，客、主雙方產生「有爭而不相喻」⁹⁷的情況。可見在子弟學養、口才皆具一定水準之後，家長便會召開幾次小型的家族清談，以作為年輕談士投入社交活動前的模擬測試，這也象徵此等清談教育已正式進入實習階段。再看：

林道人詣謝公，東陽時始總角；新病起，體未堪勞，與林公講論，遂至相苦。母王夫人在壁後聽之，再遣信令還，而太傅留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婦少遭家難，一生所寄，唯在此

⁹² 同上註，〈言語〉78，頁76。「車騎」指謝玄，卒贈車騎將軍。

⁹³ 唐翼明：《魏晉清談》，頁44。

⁹⁴ 關於「清談的理想境界」，可參上註，頁71-81。

⁹⁵ 俱見《世說新語·品藻》71，頁295。

⁹⁶ 同上註，〈言語〉75，頁75。

⁹⁷ 同上註，〈文學〉9，頁107-108。意謂正、反兩方無法溝通。

兒！」因流涕抱兒以歸。謝公語同坐曰：「家嫂辭情忼慨，致可傳述，恨不使朝士見。」⁹⁸

支遁（314-366）分明拜訪謝安，卻和年幼的謝朗講論；謝朗「新病起，體未堪勞」，謝安卻一再「留之」。足見這場後生小輩對戰成名耆宿的清談激辯，實是謝安欲把握支遁來訪的良機，令姪兒好生受教，目的則在使其早日體驗社交圈裡「談何容易」的天高地厚。⁹⁹至於王夫人愛子心焦，自讓行事操切的謝安難堪不已，故其大大稱美家嫂，大約七分發自真心，另三分則是為了緩和尷尬的氣氛。此外，家長亦會鼓勵子弟登門拜訪成名談士，名曰「請益」，實為「試劍」。如謝安弱冠便曾至王濛（309-347）府上清談，並使之深感「亶亶逼人」的不凡；可知初生之犢若能小露鋒芒，無論就經驗或名聲而言，均應獲益不少。再看：

謝公與時賢共賞說，遏、胡兒並在坐。公問李弘度曰：「卿家平陽何如樂令？」於是李潛然流涕曰：「趙王篡逆，樂令親授璽綬；亡伯雅正，恥處亂朝，遂至仰藥，恐難以相比。此自顯於事實，非私親之言。」謝公語胡兒曰：「有識者果不異人意。」¹⁰⁰

清談教育的最終目的，便是讓子弟順利登上社交舞臺。謝安帶領謝玄、謝朗參與清談活動，席間和李充（生卒不詳）問答，語畢卻立刻轉向謝朗陳述己意；可以想見當時這位年輕談士，將引起全場賓客何等亮眼的矚目。前述提及謝尚八歲便因「神悟夙成」而為眾名士歎為「一坐之顏回」，試問若非家長謝鯤的栽培引薦，一個八歲小兒縱使「語已神悟」，又豈能「自參上流」？魏晉是盛產清談「神童」的時代，綜觀陳郡謝氏對子弟清談能力的積極培養，可知天才的誕生，乃是耗費心血與資源的教育成果。

總之，陳郡謝氏透過上述文學欣賞、口才測驗、人事品評、談辯演練、名師調教與社交引薦等層次井然的清談教育，終如謝道蘊所言「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群從兄弟，則有封、胡、遏、末」¹⁰¹，爭榮競秀，人才輩

⁹⁸ 同上註，〈文學〉39，頁123。「林道人」即支遁，字道林，為清談名僧。「東陽」指謝朗，仕至東陽太守。

⁹⁹ 《世說新語·排調》1記載諸葛瑾曾派一能言別駕以妙語折服其子諸葛恪，今觀其磨練子弟的用心，正在於此。見頁417。

¹⁰⁰ 同上註，〈品藻〉46，頁287-288。李弘度，即李充；其伯李重，曾任平陽太守，趙王倫篡逆，憂疾而卒，或謂死於自裁。「樂令」指樂廣，曾代王戎為尚書令。

¹⁰¹ 同上註，〈賢媛〉26，頁377。「阿大」指謝安，昔尊稱家長曰「大人」，此語乃謝道蘊

出，至東晉中、晚期乃形成「諸謝皆富貴，轟隱交路」¹⁰²的豪門鉅族。不難察覺，在謝家欣欣向榮的「庭階玉樹」中，尤以謝玄、謝朗兩位姪兒最受謝安青睞，縱是親生之子謝琰（?-400）亦難與比。謝玄「能清言，善名理」¹⁰³，「有經國才略，屢辟不起。後與王珣俱被桓溫辟為掾，並禮重之」¹⁰⁴，其出仕軌跡頗類謝安，後亦成為謝氏扶植於桓家門下的重要棋子；繼而於淝水之戰前，由謝安「違眾舉親」¹⁰⁵，臨危受命，叔、姪兩人一同掌握建功立業的歷史時刻，而歷史則造就了陳郡謝氏的百年基業。另外，謝朗亦「善言玄理，文義豔發，名亞於玄」¹⁰⁶，後終於東陽太守；或因其天年不永，故事蹟罕著史冊。至於謝琰雖「以貞幹稱，美風姿」¹⁰⁷，卻不見謝安於其清談有何賞譽；後「苻堅之役，安以琰有軍國才用，出為輔國將軍」¹⁰⁸，則所重亦在其偉略。可知藉清談得名取仕，雖為家業興衰所寄，然而清談一事頗講究資質天賦，終不可以人力強致之。例如謝安之弟，亦即謝衰五子謝石（327-388），曾於淝水之戰出任征討大都督，史載：

于時學校陵遲，石上疏請興復國學，以訓胄子；班下州郡，普修鄉校。疏奏，孝武帝納焉。¹⁰⁹

此大類「守儒」之議，與謝氏全面「入玄」以來著重「庭階玉樹」的清談教育，可謂迥然異趣。設若謝石之於謝安，亦如謝衰之於謝鯤，乃謝氏興家的「兩可」之謀，那麼謝石「雀屏中選」的理由又當為何？史稱「石少患面創，療之莫愈，乃自匿」¹¹⁰；而清談不但是公開的社交活動，且是「要求風度之美，求語音之

言於謝安，故以「阿大」暱稱；或謂謝尚，然其輩分為從伯，不應稱「叔父」。「中郎」指謝萬，或謂謝據（亦號「中郎」），然謝據早卒，兼無令名，不稱此譽。「封」，謝萬子謝韶小字。「末」，謝安之子謝琰，小字末婢；劉注曰謝淵，*《晉書》*襲之，然謝淵為謝玄仲兄，「遏」、「末」不宜長幼失序。

¹⁰² 同上註，〈方正〉57，頁189。

¹⁰³ *《謝玄別傳》*；*《世說新語·文學》*41 劉注引，頁124。

¹⁰⁴ *《晉書》*，卷79，〈謝安傳〉附〈謝玄傳〉，頁1017。

¹⁰⁵ 同上註，頁1018。

¹⁰⁶ 同上註，〈謝安傳〉附〈謝朗傳〉，頁1021。

¹⁰⁷ 同上註，〈謝安傳〉附〈謝琰傳〉，頁1016。

¹⁰⁸ 同上註。

¹⁰⁹ 同上註，〈謝安傳〉附〈謝石傳〉，頁1022。

¹¹⁰ 同上註。

美。內在之美要通過外在之美表現出來」¹¹¹的美感饗宴。故對照謝石與諸位兄長的際遇不同，便知門閥士族欲以清談興家，雖謀之在人，亦「談何容易」！

五、結論

大較而言，高品門第積極培養子弟的才學與識見以絡繹仕途，這是門閥社會權力世襲的常態。但此一前提仍須更細膩地照應下列三個層面，即：一、小族無門資可憑，何能崛起？二、才學與識見高下，何由賞鑑？三、家業之繼承人選，何者先後？凡此均是文化資本如何兌換成政治資本的問題，唐、宋之下有科舉，魏晉之世，則賴清談。¹¹²如本文所述陳郡謝氏藉由清談興家的歷程，正顯示謝安袒護清談的「罪行」，固非全然出自一己之偏好，而實凸顯一大家族籌算積年的苦心營謀。以下茲歸納謝氏家族「清談興家」的行為特徵，並推斷其心理動機：

一、陳郡謝氏自三代謝鯤以下，始活躍於清談社交，從而名著於世，進而藉談名得官；出仕後，亦頗留心事功，如謝鯤之居豫章、謝尚之鎮豫州、謝安之總朝政、謝玄之督軍旅，均有建樹，甚者盤據一方，終至權傾朝野，而陳郡謝氏乃得以家運昌隆。試論之，陳郡謝氏自有一套完整的興家策略，亦即(1)藉清談得名→(2)藉談名取仕→(3)藉仕途建功→(4)藉功業興家；此一策略自謝鯤始現影跡，然起初未必是偶得一人之無心插柳，而實為謝氏家族的遠慮深謀。其後，謝鯤止於(2)，於(3)未彰，至四代謝尚乃克盡全功；謝尚以下，謝萬功敗於(3)，端賴謝安長居於(1)以為門戶之計，故終得興復全謀而為之救正。五代謝玄後，謝家已躋登為一世「王謝」。

二、陳郡謝氏「入玄」為名士，必藉「達行」以資「談名」。如謝鯤任誕，時號「八達」¹¹³；謝尚率脫，時目「令達」；謝奕嗜酒狂放，謝萬嘯詠率任；謝安東山高臥，謝玄丁艱肆談¹¹⁴。試論之，此「林下風氣」本元康末期藉標新立異以駭俗干名之流風，而陳郡謝氏之追附潮流，進則緣瀟灑以潤譽，取法「七

¹¹¹ 唐翼明：《魏晉清談》，頁78。

¹¹² 《世說新語·賞譽》112：「魏隱兄弟少有學義，總角詣謝奉；奉與語，大說之，曰：『大宗雖衰，魏氏已復有人！』」見頁263。按「與語」當指清談，記載說明：1.克振「衰宗」，2.品鑑「學義」，3.紹繼「有人」，均有賴清談。

¹¹³ 《晉書》，卷49，〈光逸傳〉，頁670。指謝鯤與胡毋輔之、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光逸八人，散髮裸裎，閉室酣飲。

¹¹⁴ 《世說新語·文學》41記載謝玄於服喪期間，猶汲汲與支遁清談。見頁124。

賢」之王戎；退則託曠達以全身，仿效「七賢」之阮籍，此亦理所宜然。謝尚「自然令上」¹¹⁵之名，謝萬「林澤適上」¹¹⁶之賞，即屬前者；謝鯤優遊諷議於王敦將亂之際，謝安棲遲養望於桓溫欲篡之時，則屬後者。因而陳郡謝氏自謝鯤祖述阮籍以來，於「竹林七賢」可謂推崇備至；謝安誠止子姪「臧貶七賢」已見前述，至其平素喜道「江北事」，每好作「狡獪」之語，而袁宏（約 328-約 376）據以著《名士傳》，乃有「竹林名士」之稱。¹¹⁷是知今日所聞「七賢」故事，或有「好事者為之耳」¹¹⁸，但謝安的「狡獪」附會，亦未嘗不是謝氏興家之謀自然闇合於「竹林」遺風的一種精神認同。

三、在陳郡謝氏子弟的生涯規劃中，時見昆仲殊途的選擇。如三代之謝裒與謝鯤，四代之謝石與諸謝，均為儒、玄異路；而四代謝安之於謝尚、謝奕與謝萬，則是玄門之內，又見隱、顯兩軌。試論之，此當為小族崛起時的避險之策。雖陳郡謝氏初以儒術起家，然元康玄風既盛，取徑談名者日多，不能不預圖進路，以謀家計；故謝鯤「入玄」，正為謝氏之試金石，而謝裒「守儒」，則為門戶之安全閘。其後，陳郡謝氏雖全面「入玄」且聲名鵲起，但終究是「新出門戶」，根基尚淺；故謝安藉清談養望，屢召不出，亦是儲值保本，分散風險，以防禍患臨門，謝氏菁英累卵盡碎。今觀謝朗之孫謝瞻（387-421）謂「吾家以素退為業。……若處貴而能遺權，斯則是非不得而生，傾危無因而至」¹¹⁹，足見謝氏興家之深謀，實已根植門風。至於「無競」而能「經遠」，則非談名不為功，故謝氏以清談教育栽培子弟，斯亦興家之苦心。

根據以上側寫，陳郡謝氏「清談興家」的「犯意」既明，那麼「清談誤國」的「犯行」是否成立？其實，謝氏憑藉「談」而「名」而「仕」而「功」的興家策略，若不論源頭，則此計歷上下千年而無不同；科舉時代亦經由得名、取仕、建功，相異者唯在晉身之階而已。世間無興不敝，清談敝於虛，科舉敝於實；然敝於實者猶具實效，而敝於虛者徒具虛名。如此，清談似乎有罪。

不過，清談本是社交活動，豈可與為國舉才的文官考試並比？然而魏晉之世多憑門第、才德取士，門第端視家業，才德參酌世譽，是故頗具人倫鑒別之

¹¹⁵ 同上註，〈賞譽〉104，頁 261。

¹¹⁶ 可參上註，〈賞譽〉88，頁 257。

¹¹⁷ 俱參上註，〈文學〉94，頁 146。

¹¹⁸ 〔晉〕戴逵：〈竹林七賢論〉；同上註，〈傷逝〉2 劉注引，頁 348。

¹¹⁹ 〔唐〕李延壽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南史》（臺北：鼎文書局，1978），卷 19，〈謝瞻傳〉，頁 525。

效的清談自難與現實選舉脫鉤；而一旦家業、世譽、仕途之間形成共生的三角關係，則任何置於此「利祿三角」中的事物皆必然使時人趨之若鶩，清談便是如此。也正因清談足要世譽，世譽當致仕途，仕途可興家業，因而門閥士族莫不全力栽培清談子弟，以競世譽；競世譽而竟至入險出奇，遂衍生任誕之風。流風所扇，上焉者如謝氏尚能託身保家，下焉者則所謂「苟失其本，又有越檢之行」¹²⁰；一旦暴居高位，卻才德不稱，苟非清言嘯詠以彰飾談名，抑或不問世務而侈言達行，又何以自匿？清談之為禍，當由此著。

然則託身保家亦不能無過。魏晉名士之計「三窟」、謀「兩可」，皆置家族利害於國運興衰之先；放眼東晉士族如陳郡謝氏之克己奉公者，百不及一二，猶不免汲汲自營，其餘可想而知。故謂：清談無罪，罪在謬使選舉勾串清談，遂令游藝之處反為利祿之所，而正業廢弛；因此清談確實誤國，且所誤必魏晉之世，而未必禍延他時。至於清談何以無罪而當受「誤國」之責，則徵諸陳郡謝氏「興家」之營謀，「國」與「家」銓衡於魏晉士人心中，孰為輕重，自不待言。

【責任編校：林俶萍】

【附記】

本文初成於 1998 年，原是攻讀博士期間修習唐翼明老師「魏晉玄學」課程的學期報告；其時論文題目重在探討謝氏的清談教育，因而雖曾拜讀田餘慶教授的文章，卻未細加留意。奄忽十年，唐老師《魏晉清談》始終必備於案頭，對謝氏與清談的關聯亦有了驚喜的體悟；此時閱及田教授《東晉門閥政治》，復覺眼前一片清朗。唐老師論清談著重學術內涵，田教授論謝氏側重政治奧義，小子樂於本文開此談坐誠邀大師抵掌交言，亦是向兩位先生的啟迪致上無比的敬意。

主要參考書目

專著

王葆玟：《玄學通論》，臺北：五南圖書，1996 年。

¹²⁰ 《晉書》，卷 94，〈戴逵傳〉，頁 1204。此為戴逵抨擊名士放蕩之語。

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

李延壽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南史》，臺北：鼎文書局，1978年。

房玄齡等奉勅撰：《晉書》，臺北：藝文印書館，據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刊本景印，1957年。

唐翼明：《魏晉清談》，臺北：東大圖書，1992年。

孫以繡：《王謝世家之興衰——我國門閥政治之一「個案」研究》，臺北：三民書局，1967年。

荀況撰，王忠林註譯：《新譯荀子讀本》，臺北：三民書局，1972年。

劉義慶撰，劉孝標注，徐震堦校箋：《世說新語校箋》，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

蕭子顯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南齊書》，臺北：鼎文書局，1987年。

顧炎武撰，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臺北：世界書局，據清道光十四年嘉定黃汝成刊本排印，1991年。

期刊論文

王志邦：〈謝安風流與中國士人〉，《謝太傅安石紀念論文集》，臺北：世界謝氏宗親總會，1994年。

朱紹侯：〈陳郡謝氏在東晉〉，《謝太傅安石紀念論文集》，臺北：世界謝氏宗親總會，1994年。

李則芬：〈魏晉清談〉，《兩晉南北朝歷史論文集》中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

錢穆：〈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係〉，《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三）》，臺北：素書樓文教基金會、蘭臺出版社，2000年。

審查意見摘要

第一位審查人：

- 一、東晉士家門閥藉由玄學清談致仕的論點，雖已有北京大學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一書詳申其義，但有關謝氏先祖如何規劃家族勢力，分佈儒玄雙修的策略，的確尚有可再發揮拓展的空間。本文的價值即在此一軌道中，見縫插針，銜接前人未盡之義。
- 二、但田餘慶著作頁 210（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 年版）既已點明謝氏在東晉發展三階段（1）謝鯤擠身玄學名士，謝尚取得方鎮實力，謝安屢建內外事功。則本文結論頁 22 所云謝家（1）藉清談得名（2）藉談名取仕（3）藉仕途建功（4）藉功業興家的論述，並未出田書的格局。本文若欲刊登時，應明示田書對本文重要的「啟發」並提出本文超越田書之格局何所在？
- 三、本文所引用之文獻大都不出前人重覆出現之文本，但的確能重加安排剪裁，但頁 15-21 論及門閥家學教育的模式（1）文學欣賞。（2）口才測驗。（3）人事品評（4）談辯演練（5）名師調教（6）社交引薦。諸要點卻又屬老生常談，顯然有填塞篇幅的運筆痕跡。應酌加刪改。

第二位審查人：

本文作者從自田餘慶：〈謝氏在東晉——謝鯤、謝尚和謝安〉一文的線索出發，以社會交際活動的角度「側寫」東晉謝氏家族如何在清談活動中逐步打造謝氏家族的聲望，並進而鋪設入仕坦途，實現輔政中樞，建功立業的機會。作者兼論清談可以有誤國之非議乃在於當時晉用之階倚重於因清談得來之名望，而談望未必與幹才等值，故所取之士可能非、治國之器而有廢務誤國之嫌，此乃清談風尚引發之弊端，並非清談活動本身之罪。作者徵實於謝鯤到謝安之間的仕途脈絡，挑明其興家策略，能化繁為簡，點出中朝清談和士族之間的政治通路連結；然史稱謝鯤：「通簡有高議，不修威儀，好《老》、《易》，能歌，善鼓琴。」因此，博學高略，才情與玄趣才是東晉士族克振家聲的文化資本，此外，政治客觀面的「品官蔭族」制度也應有所討論。

